

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

王中江 著

国学论丛
陈鼓应 主编

中华书局

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

王中江 著

国学论丛
——陈鼓应 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王中江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5.8

(国学论丛/陈鼓应主编)

ISBN 978-7-101-11082-1

I.儒… II.王… III.儒家-研究 IV.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7042 号

-
- | | |
|-------|---|
| 书 名 | 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 |
| 著 者 | 王中江 |
| 丛 书 名 | 国学论丛 |
| 丛书主编 | 陈鼓应 |
| 责任编辑 | 石 玉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
| |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39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082-1 |
| 定 价 | 78.00 元 |
-

《国学论丛》序

当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距离已被技术革新大大破除和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虽然各国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界限重重,但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看,各种思潮之间彼此交汇融通,让世界舞台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格局。透过历史文化的智慧结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才能够相互了解,欣赏彼此的独特性,并探讨其间的共通性。因此,在东西文明交相激荡的当下,在了解异质文化之余,继承与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显得尤为紧要。

我的师辈们大多学贯中西,具有良好的西学功底。但是,他们晚年却多选择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建构其学术灯塔,留下的学术成果也多是对本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除冯友兰先生之外,金岳霖先生,虽最早将逻辑知识论介绍到中国来,但其形上学的体系架构却围绕“道”而展开,将蕴含中国文化象征性的“道”内化于生命,既追索理智的了解,又寻求情感的满足。又如,我的指导教授方东美先生,在我受业期间,主要讲授西方哲学,但他在晚年却选择经由汇通儒释道三家而构建起旁通统贯的思想体系。通过对他们学术历程的观照,我感受到庄子“万物殊理”、“道通为一”的精神,也深切地体会到弘扬与传播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最近十几年,我发觉两岸学界大量翻译和出版西方经典与前沿研究方面的成果,对有关本国文化的研究著作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为此,我萌生了汇集海峡两岸文献功底深厚且别具创新观念的学者的稿件,来编辑一套名为《国学论丛》的丛书的构想。承蒙孔子学院总部“孔子新汉学计划”资助,这套丛书如愿出版,我对此深表感谢。我期

待,借由此套丛书的付梓,以探索民族文化艰苦历程中的延续性,找寻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生命力,整合并推动中国文化中坚力量的持续发展,使传统学术在多元世界中展开新的气象。

陳鼓應

2015 年 4 月

儒学的生命(代序)

每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传统都有可能对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以及它所在的那个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做出负责任的回应。这样的立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文化传统并不是只具有历史的意义,不是过去发生也随之成为过去或者最多是保留在“博物馆”中不能触摸的昔日遗物。反传统论者往往不仅这样认识,而且也这样期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人士似乎很公允地认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适合了当时或过去的需要,在历史上扮演了应有的角色,但在现时代,孔子之道已经变得过时而无用,这就把儒家封存在过去的时间堡垒中,使之与现代更与未来断绝了关系。这种幼稚和草率的反传统逻辑,常常又是在动听而又美妙的进步和解放的旗帜下展开的。这里批评的当然是整体性的反传统立场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而不是拒绝对传统进行深度性的反思和积极性的转化。二是由文化传统所构成的各个地域的文明并不内在意味着彼此互不相容,甚至是互相冲突,就像所说的“文明的冲突”那样。各个地域的传统文化和文明,存在着差异和不同的色彩是不言而喻的,但它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意味着我们有机会欣赏到不同文明的独特风景。借用怀特海阐述“人的差异”的话来说:“人类需要邻人们具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相异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处以便引起羡慕。我们不能希望人们具有一切的美德。甚至当人们有奇特到令人纳罕的地方,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98页)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缔造者和传承者,悲天悯人,动心忍性,以不同的途径共同追求人类的完善和福祉,使文明具有了“心同理同”的“相通性”和“普世性”。我们需要记

住“理一分殊”，记住多样性中的普遍和贯穿着普遍性的多样，不再为各个文明传统彼此之间的关系而纠缠不休；我们需要以心灵的开放和宽容，通过文明对话促成彼此的互相认识和充分理解。

儒学作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甚至是东亚文化传统），曾经是带有垄断性的正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承担者和保证者，但它在从体制中走出来的过程中，它的历史命运具有了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有人称之为“游魂”，以致于在当今世界儒学仍漂泊不定。与完全怀疑和否定儒学的激进立场相对立的无保留地信奉儒学的保守立场，同样不可接受。因为它在貌似维护儒学的宣称之下，使儒学失去了自我转化和适应的活力。儒学一旦被孤立和封闭起来，它的生命就将终结，就像被密封的木乃伊一旦遇到空气就要解体一样。这就要求我们拒绝出于任何动机和愿望的儒学原教旨主义。儒学需要一种高度的开放精神，甚至是一如既往的同化精神。在人类被日益联系起来的条件下，儒学更需要兼容差异性和多样性，文明的“和谐”恰恰要以差异性和多样的并存为前提，这是儒学“和而不同”智慧的精髓，也是儒学“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信念的精义。儒学需要向所有重大的文化传统敞开，儒学必须参与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对话和互相渗透之中，这不仅使儒学有机会从其他的文明传统中获得教益来丰富和充实自己，而且也使其他文明传统因能够欣赏和分享到儒学的魅力和价值而得到完善。这基于这样一种原则，即我们在分享不同文明的美妙之处时，我们同时也获得了攻玉的他山之石。

儒学相信普遍的理性和价值，“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揭示的就是，人类能够拥有共同的理性和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儒学一般被称为文化主义或人文教化主义。我们不必再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模式来作为衡量人类“文野之别”的标准，不过它的一个基本意义仍然值得注意，即它主要不是政治上的，更不是种族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儒家坚持认为文化和文明是普遍适用和有效的，人类应该朝向文明化和人文化的方向坚定地迈进。

儒学的传统和智慧不需要也不能在狭隘的意义上被界定，不需要也不能被固定在某一方面，“君子不器”可以用来说明儒学体系本身

的广泛性,我们应当在各个方面充分地展现儒学。正如人们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一个多元的上帝那样,我们为何要为“多元性的儒学”或“多元性的孔子”而感到不安?一个时期中,人们为了维护孔子的形象或者是纯化孔子,提出“真孔”与“假孔”之分,但这种区分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必要的,最好我们还是不要采取这种区分。这里没有任何公然鼓励人们随意塑造孔子和儒学的意图,实际上我们坚持的是严肃地面对孔子及其儒学。廉价式的表白和宣称,除了形成一时的“市场假象”外,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没有任何意义。多元儒学和多元孔子的出现,只能是创造性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以耐心和顽强的意志持久地凝视和思考儒家,我们就不能有这种奢侈的期望。

在为人类将来命运的考虑上,儒学究竟能够给予何种有力的回应和贡献,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对儒学做出原创性的构思。哈贝马斯有一个说法可以帮助理解这里的问题:“哲学应当促成一种‘有意识’的生活,它在反思的自我理解中得以澄清,并在一种非严格意义上得以‘把握’。就此而言,哲学思想的使命始终都在于对传统做出响应,也就是说,要通过对尚能使现代性的子女们深信不疑的东西的不断深入细致的观察来掌握高级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宗教学的神圣知识和宇宙学的世俗知识。在康德之后‘形而上学’是否还有可能的争论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围绕通过批判能够领会的那些古老真理的存在时间和有效范围所展开的争论,以及有关古老真理在被批判领会过程中发生意义转化的方式方法的争论。”(哈贝马斯:《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和“尊德性而道问学”。在告别分裂传统与现代性的幼稚性做法之后,问题的关键就转到了如何转化和活用儒学的资源。如把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方式之一,是认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信念与现代性法治不相容。因为人们相信现代性的法治假定了人性恶,至少就像当代学者张灏所说的那样,是承认人的“幽暗性”(“幽暗意识”),这是法治秩序得以成立的前提。儒学根本上相信人性善,相信人的良知和良能。基于对人性的这种乐观立场,儒家提倡道德治理,竭力追求建立一个依靠圣人、贤人和君子等道德榜样统治的道德理想国。然而,除非假定法治是现代政

治的唯一可能,不需要政治伦理和道德的力量,否则儒学的性善信念就不是现代政治的天然障碍物。法治既是一种客观化的秩序,同样也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法是人制定的,是社会和人的创造物,法治更需要通过人来实施。如果完全从人性恶出发设想法治,那就等于说人性恶的人或心存不良的人,能够制造出一个良好的和正义的法治秩序。从理论上说,建立和维护公正和正义的法治秩序,恰恰也需要假定人性善,并由此可以期待公正的执法者和大多数守法的公民。儒家主张道德治理,把人性设定为善,同样可以为法治秩序的有效性提供根据。儒学的道德治理的基本意义之一,是要求当政者具有优良的道德品性并以身作则,这一点原则上并没有错。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秩序无疑非常重要,但对当政者的道德要求实际上也非常高。一个合格的当政者,不仅应是守法的人,而且也应该是有德的人。要认识和理解儒学的道德政治,我们就需要把握儒学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复杂论题。从整体上说,儒学是一种“贯通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它不预设“天人”森严的二元论,更不从原子论和机械论去想像宇宙和世界的秩序,世界在他那里从来不是分裂的,更不是冲突的。儒学中的个人,只是在道德意义上被无限制地扩大,儒家式的个人超越和自我实现,恰恰是在家庭、族群、社会共同体和宇宙万物等一系列现实层面上连续展开的,它不是遁世的洁身自好,也不是入世的随波逐流,更不是来世的异想天开。按照儒家的贯通性理路,神圣即在凡俗,天道自在人心,实然亦是应然,生生即是和谐。为了回应人类面临的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失衡,我们需要把儒学“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的信念理论化和体系化。

作为历史的儒学,它是一个巨大的学问世界;作为世界观和意义的儒学,它又是一个复杂的理性、价值和信仰体系。我们不假定历史与意义、学问与价值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儒学研究的全方位开放,同时就意味着多元性的儒学。

(原为《中国儒学》发刊辞)

目 录

上 编

孔子思想新论	3
孟子的“天赋权利”思想	
——以“天爵”、“良贵”和“民意”为中心的考察	12
“心”的自我转化和精神修炼	
——荀子的“心术观”	30
学术知识的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王道理想	
——荀子儒学的重新定位	59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经典观	100
化解“义利”的紧张:严复的经济伦理	123
从超验领域到道德革新及其古典教化	
——严复的“宗教观”、“孔教观”和“新民德”	136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视野下的救世论、文明观和信仰	
——辜鸿铭的“良民宗教论”和“孔教观”	179

下 编

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215
---------------------------	-----

从儒家“六经”的形成看经典的条件	227
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意识	248
“原意”、“先见”及解释的“客观性” ——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261
儒家“圣人”理想的早期形态及其变异	280
儒家的“社会角色”意识	295
“天人之际”与“仁爱”	315
“适度”思想及适用范围的扩大 ——从人间伦理到生态伦理	323
“和”的原理和价值	331
公私之辨	343
汉代“人性不平等论”的成立	360
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379
现代新儒学的视域限制	390
20 世纪末“中国”的“儒学观” ——类型、范式和方法	402
后记	422

上 编

孔子思想新论

在有关孔子思想的研究历史中,只需考察一下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文献,就能看到,问题范围之广,诠释角度之多,评估态度之奇,似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而,今后如欲在孔子那里发掘出新的问题,并相应作出新的阐释,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对以往文献的考察显示,还存在着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问题,已有的某些论述仍需进一步推敲,诠释角度亦待拓宽。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从孔子思想中提取出若干问题,试图给予新的诠释。虽名之曰新,但不敢说就是质上的全新。

一、道德位置

在孔子思想中,仁、礼、中庸、天、命、鬼神等范畴,尤其是仁和礼,是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着仁与礼的意义及何者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似乎是这种“中心化倾向”,使我们对孔子思想中的其他个别范畴注意不够,“道”与“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仅从二者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前者 60 次,后者 38 次)来看,它们就不是无关紧要的范畴。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道”与“德”的意义以及二者在孔子思想体系或范畴结构中的位置呢?

在孔子那里,“道”与“德”都是分开使用的,还没有“道德”合成的说法。就“道”而言,孔子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统观他使用“道”的所有场合,其意义似可归约为三层:第一,指社会政治理想和目标。具体言之,是指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化、有序化、规范化和普遍

价值的优位。孔子说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所表明的是鲁国通过社会政治改革达到了理想的标准。但在春秋时代，孔子深感社会政治生活的混乱、无序和普遍价值的泯灭，他常用“无道”一词来描述这一状况。孔子所向往和追求的是“有道”的社会，他以“周”为这一理想的原型，并加以复兴（《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在实现或复兴这一“有道”的过程中，“礼”（“复礼”）、“乐”（“成于乐”）、“仁”（“节用而爱人”）、“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德”（“为政以德”）、“信”（“敬事而信”）等，都是重要的环节。第二，指真理。“道”所指称的真理之义，在孔子思想中，也是很明显的。他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士志于道”（同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信道不笃”（《子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同上），其中的“道”，都可诠释为真理。第三，指原则或方法。这一意义上的“道”，与“道”的本义比较接近。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同上）这几句中的“道”，即是方法原则之义。孔子之道的这三层意义，在思想史上发生影响的，主要是前两层。由于孔子希言天道，因而他的“道”基本上不具有形上学或本体论意义，主要是一个涵盖社会政治、人生伦理、知识和审美方面的范畴。

与“道”一样，孔子也没有给“德”作出规定。从他使用“德”的情况来看，“德”明显是一个伦理范畴。作为伦理范畴的“德”，它的具体意义为品质、品德、德行和恩德。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同上）和“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等，其“德”都为具体义。“德”除了这一具体意义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总体义，它是一切道德原则和道德行为的总名。孔子明确地把“中庸”、“忠信”和“义”等概念，归属到“德”的名下。他说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关于“仁”，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又说过“巧言乱德”（《卫灵公》）由此可知，“仁”应是“德”的条目。只是孔子“贵

仁”，“仁”不是“德”的一般条目，而是最重要的条目或核心。在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孔子所奠定的“德”的伦理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从“道”与“德”的意义分析，我们似能看出二者在孔子范畴结构中的位置。“道”应该是最高的范畴，是统摄社会政治、人生伦理、知识真理和审美等概念的总名，是真善美三大价值的统一体。如果我们欲理出孔子概念范畴体系的层次，“道”大概要居其首层。至于“德”，它既是从属于“道”的次范畴中的范畴，又是统属伦理范畴的主干，而“仁”则是它的核心。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可以说就是他自己对其范畴结构层次的一个概括。

二、仁智关系

何谓“仁”，何谓“智”，孔子有明确的界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其界定最为简明扼要。复杂的情形，大家多有考察，此不赘述。

概括来说，孔子的“仁”是伦理学范畴，其中心旨趣为“推己爱人”，“知”则是一知识或认识范畴，它既有对事物的认识，又有对伦理道德的体认。而“仁”与“智”的关系也就是知识与美德的关系。孔子是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呢？

在《论语》中，孔子多把“仁”“智”并列而举。较为典型的是下面两段话：即“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从这两段话里，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具有“仁”“智”这种品性的人的各自特点，还看不出“仁”“智”是究竟怎样的关系。孔子说君子所行者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对于“仁”“勇”的关系，孔子说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而对于“仁”“智”的关系，则没有这种直接的说法。那么，在孔子那里，是否有“仁者必有智，智者不必有仁”的思想呢？也许有。但孔子所强调的是“仁”与“智”的联系和统一。孔子说：“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这句话表明，不选择“仁”或处于“仁”，就不能说是有智慧和明智的表现。反过来看，

也就是择“仁”处“仁”，即为有智慧和明智。它一方面说“智”不能脱离“仁”，另一方面则暗示“仁”体现了“智”。这就是“仁”“智”统一和联系的思想。

“仁”和“智”的这种关系，通过孔子的“学”这一中介概念，能更清楚地看出来。在孔子思想中，“学”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提倡“好学”，赞美“好学”，并身体力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孔子所说的“学”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学”就是为了获得知识，增加智慧。它不仅是达成仁和德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它本身就体现出仁德。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又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很明显，具体的学（“下学”），追求真理（“致其道”、“学道”），是实现仁义（“上达”）、做到“爱人”的必要条件。孔子认为，喜欢仁德而不喜欢学习，就有愚蠢的弊病。他说：“好仁而不好学，其弊也愚。”（《阳货》）孔子弟子中最有仁德的是颜渊，而颜渊的最大特点就是“好学”。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夏直接肯定“学”中就有仁德。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观念相似。苏格拉底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如果说注重知识与美德、认识与境界的统一是中国思想一个整体的特征，那么，可以肯定，它是由孔子奠定的。

三、行动主义

孔子绝不是学院式哲学家或书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他一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行动。实践、活动、奋发，在他那里获得了鲜明的意义。我们用“行动主义”一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孔子总结他一生的历程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段话不可只理解为孔子的认识道路，还必